

楚庄王所说“折钩之喙”的“钩”是什么？

何文竟

据《史记·楚世家第十》记载，楚庄王八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楚伐陆浑戎（在洛阳西南），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大小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听了王孙满的回答，楚庄王悻悻回了一句：“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便是著名的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典故。关于楚庄王说的这个“钩”到底指的是什么，笔者根据个人经验和读书体会，有几点看法。

青铜带钩的钩首

熟悉带钩的人都知道，带钩的钩首普遍呈弯曲状，形态酷似禽鸟之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对“带钩”的解释直接引述了《史记》中此段原文作为书证。笔者最早接触到的青铜带钩是一件东周时期的琵琶形龙首钩，钩首弯曲的前端恰好缺失了一小截，正是标准的“折喙之钩”。所以第一次读到这则史料时，笔者脑海中没有产生任何疑问，“折钩之喙”的“钩”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带钩，并且还能相互印证青铜带钩的钩首是比较容易折断的。楚人带钩钩首偶尔断下的那一小截，收集起来就能铸造出“九鼎”，正可说明楚国人多，兵源充足，国力强盛。

兵器的弯曲锋刃

后续重读《史记》时，笔者注意到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对这段记述曾做过注解，说：“凡戟有钩。喙，钩



武王墩出土大鼎



铸客大鼎

口之尖也。言楚国戟之钩口尖有折者，足以为鼎，言鼎之易得也。”张守节的观点是“折钩之喙”的“钩”指的是戟、戈一类兵器前端弯曲的锋尖。唐代文人诗作中多见“吴钩”意象，如李贺、王维、杜甫、李白等人均以“吴钩”指代精良的兵器，足见唐人普遍是将“钩”与兵器联系在一起的。张守节的这种说法完全贴合楚庄王炫耀武力，并对王孙满有点怨恨与傲慢并存的心态。

弯曲农具的刃尖

再后来笔者又在《汉书》中发现了另外一种“钩”。《汉书·龚遂传》记载，西汉宣帝时期“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汉宣帝启年过七旬的龚遂为渤海太守，龚遂为了安抚百姓，到郡后“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鉏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

得问，持兵器乃为盗贼”，果然“郡中翕然，盗贼亦皆罢”。这里将“鉏（锄）”与“钩”连用，并与“兵（器）”对举，因此这个“钩”显然指的是镰、铎一类的弯曲状农具。如以此解读“折钩之喙”，则楚庄王意在彰显楚国人口繁盛、农业发达、国家充盈，同样是逻辑自洽。

从文义上来看，“折钩之喙”的“钩”无论是指导带钩、兵器还是农具均可自圆其说，也都能找到相关文献的佐证。很多历史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理解做出不同的判断。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安徽淮南武王墩楚王墓又发现了一件与安徽博物院藏20世纪30年代在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发现的楚铸客大鼎（高约113厘米、重约400公斤）体型几乎完全一样的青铜大鼎，看来楚王或许真的曾尝试过铸造楚国自己的“九鼎”。

（作者单位：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深海五百年，丝路连天下——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重大考古发现的影视传播矩阵

王天娇

深海1500米，没有光，没有声音，只有极端的压强与漫无边际的黑暗。2022年10月，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三亚东南约150公里海域的1500米深处，发现了2处明代中期的沉船遗址，被分别命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和“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

2023年至2024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对该处遗址进行了三个阶段考古调查，沉船历史真容日渐清晰：一号沉船货物以瓷器为主，涵盖青花、红绿彩、素三彩、珐华彩、单色釉等品种，产地以景德镇为主，年代为明正德年间（1506~1521），推测文物总量超过10万件。二号沉船满载印度洋乌木，系海外归程的商船，年代为明弘治年间（1488~1505）。两艘贸易商船相距12海里，一去一回，如同历史的切面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贸易，殊为难得。正如该调查项目负责人宋建忠所言，这一发现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它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研究的关键缺环，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

纪录片异彩纷呈

这一凝聚着中华文明显著特性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需要让国人了解，更需要与世界分享。为此，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出品的纪录片《深海遇见丝路》率先扛起这面大旗。该片聚焦南海西北陆坡沉船考古发现，以水下考古之专业、出水瓷器之精美和古代航海故事之悲壮，用国际化叙事语言，带领全球观众走近这段深藏于南海的中华文明传奇，并一举摘得第47届美国泰利奖纪录短片银奖（2026年）。泰利奖创办于1979年，有“美国电视界奥斯卡”之称，是全球纪录片、电视节目的最高奖项之一。这一奖项有力证明了中国的高考故事，完全可以用让世界听懂的语言来讲述。另外，该纪录片还获得第31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短片“十佳作品”（2025年），并入选中宣部“文化中国行”主题宣传活动。

围绕这一重大发现，除面向国际传播的《深海遇见丝路》外，央视等

各大媒体均将镜头聚焦到这一题材上，共同构建起影视传播矩阵。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二季《水下考古》在央视一套播出，以全景视野将南海西北陆坡沉船纳入中华海洋文明的宏大叙事，充分展示了水下考古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创造的世界水下考古壮举。

在南海西北陆坡沉船系列影像作品中，最早将这一重大发现以科技叙事语言呈现给观众的，是在央视9套（CCTV纪录频道）播出的系列纪录片《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第一季中的《深海勇士》。该片重点呈现了中国载人深潜科技与水下考古的深度融合，值得一提的是“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整体国产化率高达95%，从浮力材料到深海锂电池等核心部件均为中国自主研制。《深海勇士》纪录片正是以这一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国重器作为叙事支点，赋予了水下考古更深厚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三沙卫视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瓷路万里》，以一号沉船发现的珐华彩瓷器为线索，探寻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历程，成功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5年精品节目片单，并入围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电视纪录片单元。央视科技文保纪录片《重生技》第二季首集《珐华出水技》，则聚焦珐华彩瓷器的科技修护全过程，将文明延续的感动送入千万普通观众的心中。

专题专访央地同采

与纪录片制作周期较长不同，专题报道、人物专访可较快形成合力报道。2024年6月，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刚结束，央视栏目即对考古项目负责人宋建忠进行深度专访。这位带领团队在1500米深海打捞历史碎片的考古人，第一时间走到公众面前介绍本次发现和重要意义。同年10月，央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节目以“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为题先后报道，共同构建起最权威声音的传播。与此同时，地方媒体的深度报道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传播矩阵。东方卫视考古文博类专栏《中国考古报道》对这一考古发现进行专题报道，三沙卫视高端访谈栏目《自贸先行

者》以《探南海遗珍 焕丝路华光》为题，对宋建忠进行深度专访。海南卫视高端访谈栏目《自贸佳》推出《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赋能 开启深海考古新篇章》，聚焦深海考古技术的突破性应用，呈现科技创新与考古深度融合的“中国经验”。央地媒体在不同维度上同频共振，共同为深海考古的故事传递至更广阔的人群。

AI短片创新传播

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来自新媒体领域的创新探索。2026年2月，由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海南日报联合制作的AI短片《渡沧溟——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前世传奇》正式上线，这是国内首部以AI技术制作的考古短片。该片依托考古发现和文献史实，虚拟故事情节，以匠人、船夫的命运为线索，借助AI技术生动还原了五百年前那艘商船的悲壮故事，一经发布便在海南日报、B站等不同媒介广泛传播。2026年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该片荣获了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的优秀项目。事实证明，传统手段难以解析的考古现场，完全可以用最新的AI技术去充分展现，《渡沧溟》的推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CGTN的国际纪录片斩获泰利奖，到B站上的AI短片点燃年轻用户；从CCTV-1旗舰频道的《寻古中国》，到入围金鹰奖的《瓷路万里》；从《面对面》的深度专访，到《焦点访谈》的特别报道，南海西北陆坡沉船考古所激发的这场全媒体传播实践，已远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文物考古宣传。它正在构建一种全新的大众考古范式：考古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精深学术，而是每个人都能够参与、感受、共情的历史对话；文物不再是冰冷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是借助影像与技术重新复活在公众心中的鲜活生命。

两艘五百年前的商船，一艘满载景德镇瓷器，一艘满载印度洋乌木，无声地沉入南海深渊。500年后的今天，它们借助中国人的智慧与勤劳，借助影像的力量与科技的语言，重新浮出水面，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一座文明之桥。这正是这一伟大发现所配得上的传播高度，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生动诠释。

（作者为央视纪录片《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之《深海勇士》编剧）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各行各业的整体发展，学科交叉和行业“跨界”融合屡见不鲜，极大地深化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结合，考古学领域同样如此，且至今依然在经历这一创新性发展过程。这不仅体现于专业的学术研究层面，也表现在其与社会相关领域的实践互动，推动了考古学的理念发展、技术革新、范畴拓展，以及考古学的社会价值发挥。

城市考古与保护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不仅研究对象综合性强，规模宏大，且多为古今重叠型城市，面临的社会现实压力较为突出，即考古与保护和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协同。这使得城市考古与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科研工作，也是一项具有广泛现实性的社会活动，直接决定了多学科和多行业融合的必要性。城市考古与保护根据其研究对象、工作性质、学科边界、目标重点、相对阶段、方法技术等特征，又细分为城市考古、保护、利用三个连续却存在差异的部分。为避免阶段割裂和学科壁垒，强化“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推进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亟须对城市考古与保护领域的多学科和多行业融合进行探讨。

根据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的相对进程关系，三个部分又可称之为三个阶段，相互递进，相互交织，却又存在明显的工作目标区别，也就决定了三个阶段的主体学科、方法技术等存在差异。结合学术科研和实践工作，以系统性和结构化的工作机制为引领，对不同阶段的多学科融合进行梳理和分析，能更好地编制城市考古与保护的整体工作计划，科学设计全阶段、全流程的工作思路和逻辑，明确各阶段工作重点，强化各阶段之间的串联和相互支撑，进而提升城市考古与保护的整体工作质量；同时，也是贯彻“大考古、大保护”理念，建构考古-保护-利用的“三位一体”体系，以我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体系建设的宏观发展统筹考古、保护、利用的微观协同，以三个部分均衡提升的微观成效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大局。

城市考古部分

这部分以考古学目标为核心。不论是主动性考古，还是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均要坚持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和工作要求。在多学科融合方面，必须以考古学为中心，设计多学科参与的专题方向与形式，形成“中心目标-专题方向”的多学科协同体系。既充分利用传统考古学中的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聚落考古等理论，也需要碳十四测年、陶瓷成分检测与溯源、体质人类学等科技考古研究，辨识古代遗存，探究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复原遗存面貌，并认识古代城市整体的形态。另一方面，为全面解读遗物、遗迹、遗址、城市整体、区域文化等多维信息，不仅需要历史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环境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参与，也需要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人工智能、三维扫描与建模等新兴技术的参与，挖掘遗存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理清遗物-遗迹-遗址-城市-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环境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探究古代城市产生、发展、衰落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内部构成要素的演变，逐步“钩织”出古代城市的整体形态，描绘古代人的生产生活场景，解读并阐释考古遗址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多重价值内涵。

城市考古遗址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地处人口稠密、文化需求多样的现代城区，在城市考古阶段必须考虑遗址保护和有限的社会开放等需求。所以，在城市考古过程中需兼顾保护和利用两个方面的相关学科和行业参与，以作为不可缺少的“辅助”支撑。保护部分主要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的遗物、遗迹、遗址，以及探方的保护，涉及文物保护规划和方案、物理和化学加固、文物影响评估等相关工作，以实现考古遗存、探方、附属设施等全面保护；利用部分主要针对有限的公众开放，如各类主题日、宣传报道等活动，涉及文化遗产学、旅游学、社会学等领域，能够更好、更专业地做好城市考古阶段的活化利用。

保护部分

这部分以考古遗存的可持续保护和科学管理为目标。基于保护内容和形式的差别，保护部分主要包含宏观的文物保护规划和微观的文物保护方案两个层面。在文物保护规划层面，其作为考古、保护、研究、利用、衔接其他规划等各项工作的综合性法律文件，能够从宏观管理层面明确保护区划和规划年限，对接城市发展、土地调整、文旅融合等规划，对于城市考古与保护面临的现实发展压力，文物保护规划的管理和衔接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文物保护规划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制，参与的主要学科是城乡规划学、考古学、文化遗产学；同时，为保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也需要生态学、景观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化地理学、建筑学等相关领域参与，以做好城市考

浅析城市考古与保护的多学科和多行业融合

李标标

古遗址保护的用地变更、社区协调、文化空间布设、公众参与等总体规划。在文物保护方案层面，尤其是规划文件中保护部分的专项落实，工作对象是遗址本体、出土文物和探方，根据详细的勘察分析而制定具体方案，目的在于充分应用各种传统和新技术处理破坏现象和潜在威胁，实现考古遗址的可持续保存。目前保护方案编制和实施工作参与的主要学科是文物保护技术，以及紧密相关的化学、材料学、物理学；随着保护需求的变化和新技术的迭代，如X光、超声波、电子显微镜、金相显微镜观测、光谱分析、红外照相等技术也逐步参与其中，极大地提升文物保护方案设计和工程实施的科学性。

基于城市考古遗址的价值和城市文化建设需求，部分遗址需进行原址保护和活化利用，这决定了保护工作需要考量利用的需求。所以，保护部分在统筹主要参与学科和次要相关学科的同时，也需要将利用部分的多个学科作为“辅助”纳入融合范畴。文物保护规划中展示利用是不可缺少的章节，区别于考古阶段的限制性开放，需要与旅游学、博物馆学等学科和行业交叉，进而设计全面系统的活化利用方案；文物保护方案则需要根据展示利用的需求，对部分遗存进行复原或修复标识，提升考古遗址的可视性和可读性。

利用部分

这部分以城市考古遗址的活化利用为主题。对比郊野型考古遗址，城市考古遗址地处人口稠密、经济发展层次较高、基础条件优越的城市区域，活化利用的社会需求更高、现实效益更迫切。通过遗址本体展示和配套宣讲设施，科学布局展示功能和分区，设计多元展示形式，阐释考古遗址蕴含的历史文化，能够塑造高品质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由此，利用部分的主体学科是文化遗产学、旅游学、博物馆学，围绕城市考古遗址的“基本”利用进行研究和实践。同时，城市考古遗址作为价值内涵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城市文脉赓续、文化形象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利用部分需要将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管理学、景观学、艺术学、教育学，及文化产业、公共服务、新媒体等作为“辅助”，推进遗址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考古遗址融入城市社会整体发展，最大程度地发挥考古遗址活化利用对广泛社会领域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公约到我国的相关文件，均强调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应以相关研究和系统保护为基础，进而全面挖掘和阐释其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地将考古遗址呈现在公众面前。故而，考古遗址在展示利用阶段并不意味着考古工作的结束，考古与相关研究工作是贯穿保护、利用等活动全阶段的，在利用阶段仍需将考古学研究作为重要参与学科。

城市考古与保护的多学科和多行业融合分析

围绕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宏伟目标，城市考古、保护、利用三者之间相互递进、相互支撑，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一方面，三个阶段在本质层面是多元统一的，考古离不开必要的保护和利用，保护必须以考古工作成果和利用需求为依托，利用则是基于考古研究成果的深入挖掘和阐释，共同形成了一项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社会活动，必然需要多学科和多行业的参与。另一方面，不同的工作阶段和目标要求决定了城市考古与保护的多学科和多行业融合并不是平均参与，而是分阶段分重点，有主有次；考古阶段围绕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以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为主体，联合相关学科和行业，从多元视角共同推进考古研究；保护阶段围绕实现考古遗址的可持续保存和科学管理为目标，以文物保护规划和方案为重要手段，以城乡规划学、文化遗产学和文物保护技术为主体，融合相关学科和技术，全面提升考古遗址的管理和保护水平；利用阶段围绕考古成果的活化利用为目标，以文化遗产学、旅游学、博物馆学为主体，交叉相关学科和领域，科学发挥考古成果在多维度的社会价值。

总体而言，城市考古与保护的工作成果质量和社会效益取决于多学科和多行业融合的系统性设计。多学科和行业的参与，不仅可以增强城市考古与保护的科研成效，也可以提升考古与保护的实践工作质量，逐步构建具有高水平、代表性的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体系，更可以从更加广泛的层面发挥考古与文化遗产在社会各类学科和行业中的价值与影响，以真实完整的历史文化激发相关学科和行业的创新力，创新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滋养，营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广告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数智护文脉
元智赋新生

文化遗产全链数智
解决方案提供商

科技保护

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隐蔽设施、文物运输监测、文物展柜、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

智慧管理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智慧服务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咨询服务、熏蒸消杀服务、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13572270596（张总） 座机：029-88246388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www.microwise-system.com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研发园E座4F